



第三章

家庭的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与子女学业成就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家庭文化资本作为分析社会不平等的理论概念，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他们致力于研究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教育获得或地位获得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教育获得或地位获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由此验证了布迪厄的观点：经由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社会阶层的优势得以保持和延续。

在我国，尽管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或教育获得的影响作用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但现有文献依然存在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当前研究基本上延续了布迪厄的思路，比较不同阶层在文化资本存量上的差异，并用文化资本的存量差异去解释学业成就或教育获得的差异，这便预设了文化资本只有存量上的差异，并无质的不同，因此也就忽视了对以下问题的探讨：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而非不同存量的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或教育获得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现有研究虽然已开始关注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或教育获得作用的阶层差异问题，但在统计分析方法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①文化资本的操作化问题。有研究将文化资本的不同类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化资本变量（吴愈晓等，2017），这种处理方式忽视了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异质性，其合理性存疑。②统计模型的应用问题。有学者针对不同阶层分别建立回归

模型，比较文化资本变量在不同阶层的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的差异（孙远太，2010），这种方法已被证实存在删截问题，其结论并不可靠。

鉴于此，本章利用全国性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致力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不同类型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的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二是家庭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作用，是否存在阶层差异？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社会背景下不同类型文化资本作用方式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家庭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第二节 文献回顾

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由布迪厄提出，用来分析社会不平等是如何在代际间进行传递的。他认为，不同阶层的学生在进入学校时，拥有的文化资本是有差异的，这些文化资本包括语言能力、顺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人际交往技能等，这些资源可以通过学生在家庭及相关环境中的早期社会化经历而获得。学校教育传授的知识和选拔人才的标准与上述文化资本具有内在亲和性，来自社会上层的学生文化资本更丰富，更容易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在分析文化资本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时，学者们致力于回答下列问题：①文化资本是否与教育不平等有关联；②如果两者有关联，文化资本又是如何影响教育不平等的。

一、文化资本是否作用于教育不平等

有学者以法国学生为研究对象，认为在法国，家庭文化资本对阶级再生产的影响很小，文化资本造成教育不平等或社会不平等的机制并未得到证实（Robinson & Garnier, 1985）。还有学者对希腊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文化资本越高，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标准化测验成绩影响的机制，

主要是通过学生的能力和努力，而非通过文化资本（Katsillis & Robinson, 1990）。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提供的各类资源都对子代教育获得发挥作用：一方面，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如父亲党员身份开始对教育获得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传统分层标准，如上层阶层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在教育分层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Wong, 1998）。对瑞典的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对阅读得分发挥显著积极作用（Myrberg & Rosén, 2009）。对斯洛文尼亚中学生的研究发现，文化资本和认知能力均对教育获得发挥显著作用（Flere & Kirbiš, 2010）。

对韩国的研究发现，家庭客观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有积极作用，但学生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有不利影响（Byun et al., 2012）。与韩国研究的发现不同，在日本社会中，身体化文化资本对初中升高中的学习成绩发挥积极作用，但父母为孩子阅读及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不发挥作用，而身体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对最终学历均发挥积极作用（Yamamoto & Brinton, 2010）。吴愈晓将家庭文化资本操作化为家庭的客体化文化资本和父母的文化活动，分时期探讨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国人升学的作用，发现文化资本对升初中和升高中发挥显著作用，例外是“文革”时期：它对升初中的作用有所减弱，对升高中没有影响（Wu, 2008）。

以上研究表明，对于文化资本是否发挥作用，以及文化资本的哪些方面发挥作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所反思的，文化资本研究的结论众说纷纭，原因可能在于：①许多彼此不同的概念被冠名为文化资本，从最初的孩子和家长参加高雅文化活动，到后来的家庭阅读习惯和文化氛围、家庭教育资源、课外活动、家长与孩子交流文化社会政治等议题的频率等（Jæger, 2011）；②文化资本要转化为学业成就或教育获得，需满足被学校环境认可这一前提，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文化资本会被学校重视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主观的标准，因国家、地区的不同而不同（Kingston, 2001）；③文化资本在解释学业成就时还面临一个问题，即这种学业成就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排他性文化实践的结果，只有当这种文化实践真的存在时，文

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方有解释力。但某个社会中真的存在排他的、为特定阶级所垄断的文化实践吗？

二、文化资本如何作用于教育不平等

对于这个问题，布迪厄认为来自社会上层的学生文化资本更丰富，因此更容易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Bourdieu & Passeron, 1990）。拉鲁认为文化资本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对上层阶级文化的熟悉，而且包括个人通过灵活地使用知识、技能来满足社会制度评价标准的能力，这种特别的能力可以在代际间传递，为特定阶层垄断，形成阶层“优势”（Lareau & Weininger, 2003）。总之，社会阶层越高，文化资本的回报就越大，文化资本加剧了教育不平等。这一模式被迪马乔描述为“文化再生产模式”（Dimaggio, 1982）。

基于对当代社会结构中社会流动较为普遍的观察，迪马乔批评布迪厄的看法有时偏向决定主义和宿命论，他采取一种较为宽泛的方式看待文化资本，认为文化资本有一部分是在家庭中伴随着成长过程获得，但也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后天积极参加文化活动而获得和积累。因此学生在校内或校外参加文化活动对学习成绩也有帮助。迪马乔将这种通过参加文化活动而获得文化资本的方式称为“文化流动模式”（Cultural Mobility Model），他的研究发现女性符合文化再生产模式，而男性符合文化流动模式，因为女性更好地继承了家庭文化资本，而男性则表现出对本阶层文化的叛逆（Dimaggio, 1982）。德赫拉夫等通过对荷兰的研究，也验证了文化流动模式的存在，阅读习惯对中下阶层学生教育获得的作用大于中上阶层学生（de Graaf et al., 2000）。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实施，使开展文化资本的国际比较研究成为可能。有学者按照国家的福利供给情况、社会不平等水平和开放度将国家分为四类，来比较文化资本在这四类国家中发挥的作用有无差异。结果发现，福利供给较少、社会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更符合文化再生产模型，而其他国家相对更符合文化流动模型（Xu & Hampden-Thompson, 2012）。

还有学者对中国文化资本的作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如孙远太（2010）分析了文化资本对上海市民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大于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文化流动模式对上海市民更有解释力。与之不同，吴愈晓等（2017）的一项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的效应存在阶层差异和学校差异，阶层越高，学校越好，文化资本的作用就越大，由此认为中国社会符合文化再生产模式。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研究经历了一个概念操作化日益精细、对其作用方式的探讨更加全面细致的发展过程，多数研究发现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发挥积极作用，并对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过程和机制进行了探索，但也存在两点缺陷：一是对文化资本概念的操作化莫衷一是；二是在具体结论上有所差异甚至相互矛盾。这其中诚然有不同国家的教育系统特征不同、社会分层模式和社会开放程度差异等原因，但是对于同一国家，如中国的研究，其结论也呈现显著差异甚至明显矛盾，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研究结论的差异和相互矛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资本的操作化存在显著不同。这源于许多研究基于对大型调查数据的二手分析，研究主题和问卷设计大多并非围绕教育，可用的变量和指标有限，导致无法对文化资本的作用进行充分详细的探讨；或者即使运用了专门的全国性教育调查数据，但对文化资本的操作化方法具有争议性。如吴愈晓等（2017）的研究将客体化文化资本和身体化文化资本整合为同一个因子，并未考虑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作用的正负差异。二是所用模型的差异。以往学者对于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模式的研究，有两种技术路线方法，一种是在模型中纳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资本的交互项；另一种是按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划分为两个群体，分别建立回归模型，比较两个模型中文化资本自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两种方式也都为中国学者沿用，但后面这种处理方法存在删截问题，所得结论并不可靠。

本章尝试克服已有的文化资本作用研究的上述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结合中国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就制度性文化资本、客体化文化资

本和身体化文化资本如何分别影响学业成就，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提出研究假设，并建立模型予以验证；二是文化资本对于学业成就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通过探讨客体化文化资本、身体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分别对学业成就的作用，来分析文化资本在中国究竟是发挥了阶层稳定器的作用，还是促进阶层流动的作用。

第三节 研究假设

一、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类型

布迪厄把文化——特别是以文凭形式存在的文化——视为一种特殊的资本类型，这种资本可以通过时间、精力、金钱获得，然后用来获得具有高地位、高收入的职业。简言之，文化资本指与个体地位获得和地位象征有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产，它具有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存在形态（Bourdieu, 1984）。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上层阶级的专属，在实际研究中往往被操作化为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高雅文化（Bourdieu, 1984）。显然，这种将文化资本视为上层阶级专属并操作化为高雅文化的做法过于狭隘，限制了文化资本概念的解释力。后来的学者逐渐突破了这一限制，不断地丰富其内涵，时至今日，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涵盖了更为宽广的意涵：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一般指一种身体和心灵的持续性倾向；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主要是指教育文凭；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态则指的是图画、书籍、字典、乐器、仪器等文化产品。总之，广义的文化资本既包括布迪厄所言的高雅文化的知识、参与，又包括家庭氛围、习惯、风格、一般性技能、教育文凭、文化产品等。

但是，文化资本要发挥作用，还要依赖其他的条件。学校环境就是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胡安宁（2017）的研究发现，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环境（包括教师）是否欣赏学生的文化资本，以及这种欣赏能否转化为学业成就。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艺术史和哲学

是学校中很重要的科目，而且教育体系及其代言人认同社会上层的高雅文化，因而熟悉本阶层高雅文化的中上阶层的学生更容易在教育系统中取得成功。但在荷兰、韩国等国家，这些科目并不是很重要，因而对这类国家的研究并未发现与高雅文化有关的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或教育获得发挥作用（de Graaf et al., 2000），甚至还有负面影响（Byun et al., 2012），发挥作用的是阅读习惯或家庭客体化文化资本等。我国的教育体制与后者类似，因此，在我国真正对学业成就发挥作用的文化资本，应该不是与高雅文化有关的文化资本（如参加文化活动），而是与课程学习有关的文化资本（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藏书、家庭阅读活动等）。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3-1a 至假设 3-1d。

假设 3-1a（身体化文化资本）：亲子参加文化活动，对孩子学习成绩没有显著作用。

假设 3-1b（身体化文化资本）：亲子阅读活动越多，孩子学习成绩越好。

假设 3-1c（客体化文化资本）：家庭文化设施越丰富，孩子学习成绩越好。

假设 3-1d（制度化文化资本）：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孩子学习成绩越好。

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资本作用的差异

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掌握的文化资本在数量和种类上就越具有优势，文化资本对子代发挥作用就越大。从布迪厄对资本的定义来看，各种非经济的资本事实上是“经济资本的转化和伪装形式”（Bourdieu, 1986）。一方面，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可用各种经济资本的投入丰富子女的客体化文化资本；另一方面，这类家庭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使对孩子时间的投资成为可能，便于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将特定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此外，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一般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便于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藏书量、带孩子参加高雅文化活动、让孩子参加补习班等教育投入等指标上具有显著优势（洪岩璧、赵延东，2014）。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揭示了不同

阶层家庭在教养方式上的差异：中产阶级采用的是“协同培养”方式，工人阶级采取的是“自然成长”方式；采用协同培养方式的家长，更积极地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也更积极地与学校沟通，他们的子女学业成绩更好（Lareau, 2003）。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够更好地利用文化资本这种手段，促进孩子的学业成就。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2a至假设3-2c。

假设3-2a：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受教育年数对孩子学习成绩的作用越大。

假设3-2b：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文化设施对孩子学习成绩的作用越大。

假设3-2c：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亲子阅读活动对孩子学习成绩的作用越大。

第四节 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章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的基线数据。CEPS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112所学校约2万名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在对变量进行处理并删除缺失值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数为18045。

二、变量与描述统计

（一）因变量：学业成就

本章通过被访者（学生）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期中考试成绩的标准化得分之和来测量学业成就。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成绩的原始分数由学校提供，而非学生自填。将这三科得分按照学校、年级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使分析结

果易于理解又将标准化得分转换为取值为 0~100 的学业成就变量，然后加总。数字越大代表学业成就越高。

（二）核心自变量：文化资本

根据文化资本的定义和常用的操作化方式，我们使用家庭文化设施、亲子参加文化活动和阅读活动的频率以及父母受教育年数来分别测量客体化文化资本、身体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

家庭的文化设施情况包括是否配备独立书桌、电脑、互联网和藏书情况。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和最大方差旋转法对上述变量提取公因子，标准化后得到一个取值范围在 0~100 的家庭文化设施变量，数字越大代表家庭客体化文化资本越丰富。

问卷询问了中学生和父母一起做以下事情的频率：①吃晚饭；②读书；③看电视；④做运动；⑤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⑥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同样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和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出现了两个因子，⑤和⑥主要负荷于因子 1，②和④在因子 2 上的负荷较强，与我们对亲子文化活动与亲子阅读活动的区分相吻合。用因子 1 上负荷较强的题项来构建参加文化活动频率的测度，用在因子 2 上负荷强的题项构建参加阅读活动频率的测度。对其标准化后分别得到亲子参加文化活动变量和亲子参加阅读活动变量，取值均为 0~100，数值越大代表家庭参加此类活动越多，家庭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越丰富。

父母受教育年数是通过询问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取两者之中的较大值，并按一定规则换算为受教育年数。其中，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赋值为 0 年，小学赋值为 6 年，初中赋值为 9 年，高中、职高、中专、技校赋值为 12 年，大专赋值为 15 年，大学本科及以上赋值为 16 年。

（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本章使用家长职业地位、家庭经济条件、参加辅导班数量、参加兴趣班

数量这四个指标测量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四个指标均为虚拟变量。

家长职业地位以父亲的职业来测量，如果父亲职业的答案缺失，则以母亲职业代替。原始问卷中父母职业的类型划分较细，为便于统计分析，对部分职业类型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职业类别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商业或服务业人员、农民或其他。在统计分析时生成四个虚拟变量，以最后一类为参照类。

家庭经济条件，通过询问被访者目前的家庭条件来测量，答案包括“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中等”“比较富裕”“很富裕”。重新编码后分成三类，即“困难”“一般”“富裕”，在统计分析时生成两个虚拟变量，以第一类为参照类。

参加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数量反映了家庭经济实力和教育支出，因此也纳入分析。问卷中询问学生参加了哪些兴趣班/课外辅导班，让其在11门课程中进行选择（可多选）。在11门课中，4门属于课外辅导班，7门属于兴趣班。对于每一门课外辅导班课程，参加了的计分为1，否则为0，然后把4项分数相加得到参加辅导班变量，该变量的取值为0~4的整数，同理可得参加兴趣班变量，取值为0~7的整数。

（四）控制变量

本章的控制变量包含：①性别（0=女性，1=男性）；②年龄；③兄弟姐妹数；④户籍属性（0=非农业户口，1=农业户口）；⑤迁移流动状况（0=省内流动或跨省流动，1=本地非流动）；⑥认知能力，用学生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来测量，这套认知能力测试题不涉及学校课程所讲授的具体记识性知识，只测量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测试题分为语言、图形、计算与逻辑三个维度，将其转化为0~100的值。由于本章选用的因变量“学生语文、数学、英语单科成绩”是按照学校、年级计算的标准化得分，不受学生年级（七年级、九年级）以及学校类型（公立学校、公办助、普通民办、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影响，因此不将年级和学校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1所示。

表 3-1 家庭文化资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	变量	均值 / 比例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业成就	英语标准化得分	61	10.19	0	100
	语文标准化得分	71.98	9.69	0	100
	数学标准化得分	63.39	10.10	0	93.36
	总分	196.38	26.17	34.31	273.51
文化资本	父母受教育年数	10.78	2.94	0	16
	家庭文化设施	56.44	24.12	0	100
	亲子参加文化活动	24.35	26.25	0	100
	亲子参加阅读活动	46.77	35.52	0	100
家长的职业地位	管理人员	12.20%	—		
	专业技术人员	6.09%			
	工人	25.71%			
	商业或服务人员	25.35%			
	农民或其他	30.64%			
家庭经济条件	困难	11.73%	—		
	一般	76.72%			
	富裕	11.54%			
教育支出	参加辅导班数量	0.59	0.95	0	4
	参加兴趣班数量	0.43	0.81	0	7
控制变量	性别（男性=1）	50.83%	—		
	年龄	14.51	1.24	12	18
	兄弟姐妹数	0.73	0.82	0	5
	户口（农业户口=1）	54.92%	—		
	迁移流动状况（本地非流动=1）	82.35%			
	认知能力	43.23	18.06	0	100

三、模型和分析步骤

根据因变量的特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分三步。第一步是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并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对学业